

杜

经

国

史学论著自选集

公元出版有限公司

杜 经 国
史 学 论 著 自 选 集

公元出版有限公司

二 〇 〇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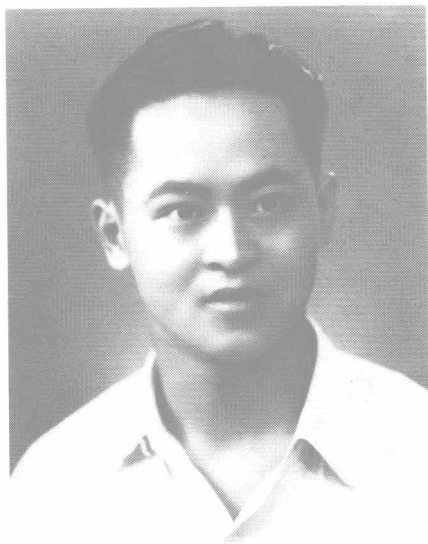


杜经国史学论著自选集
杜经国 著

出版：公元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新蒲岗伍芳街8号
利嘉工业大厦5字楼E室）
印刷：汕头市春风印务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城南沧洲工业区）
电话：0754-3873939 3873839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29.5
字数：350千字
印数：1-600册
版次：2004年11月第一版
200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HK\$ 100元 Y 60元
ISBN：988-97484-7-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 序



本文作者考入北大时留影

1931年8月中旬,我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土桥镇。这里离我的祖籍合肥市肥东县约二百里,是个江边小镇。我出生后不到十天,长江安庆段上下爆发特大洪水,小镇沦为一片泽国,母亲方惠贤半夜里抱着我冲上江堤,才免于灭顶之灾。那时,父亲杜善之在江轮上当船员,川走于上海、武汉之间,兼营长途小额贩运,维持生计。

洪水过后,我们一家回到合肥,父亲在城里开了一间布店,我的童年是在合肥城里渡过的。

但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飞机就不断空袭合肥,害得我们经常躲进防空洞。1938年合肥沦陷前,我们就已回到肥东县乡下老家。这里虽离城不到四十里,但终究安全些。这时我已快七岁,早就该上学读书了。乡下没有小学,只好上村里的私塾。我在私塾里背了四年多的古书,对《论语》、《孟子》尤为精熟,可以整本一背到底,很受塾师喜爱。

这时,父亲在离肥东县不远的三河镇经商。三河是巢湖边上的重镇,扼水陆要冲,乃兵家必争之地。1858年,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曾在这里击毙湘军悍将李续宾,歼敌六千,使曾国藩为之丧胆。1942年秋,父亲为让我受到学校正规教育,把我和母亲接到三河。他本打算让我直接上初中,但考虑到我在村塾里没有学过数学,就联系一所小学去读六年级,以便过渡一下。不料上学第一天,老师就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数学题,让我演算。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题,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这时,老师很客气地把我领到五年级教室,五年级老师又将这个把戏重演一遍并把我送进四年级教室,如此这般直到二年级才草草收场。就这样,一天之内,应该说是一个小时之内就把我连降四级!这显然是一场恶作剧,是对我这个乡下村塾里来的孩子的嘲弄!

放学后,我回家向亲如实汇报。父亲对爱子受此羞辱大为恼怒,立即找朋友帮忙,把我送进镇里唯一的一所中学——肥南中学初中一年级,当上了堂堂正正的中学生。

父亲出了一口恶气,我却太不争气,居然在一年级接连留了两级。到1945年同班同学大都上了初三,我还在初一鬼混。究其原因,基本上是两个。一是老问题,没有学过数学;二是沉湎于听大鼓书。那时,镇上有好几摊说大鼓书的,其中一摊就在我家附

近,说的是《三国》、《水浒》、《杨家将》等历史故事,情节紧张,内容生动,每天下午一场,我基本上是每场必到,把学业丢到了一旁。有一位姓周的小家伙也是个古书迷,与我结成“死党”,经常一起逃学,成了全校知名的两个顽童。

幸好,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一家很兴奋地回到了久违的合肥,父亲在城里东大街买了一进有两间铺面的住房,开店经商。东大街历来是合肥的主要商业街,清末民初半条街都是李鸿章家族的产业。但李氏子孙好象没有几个成器的,仅仅半个世纪,这些产业就陆续转入平常百姓家了,我父亲检的这个小铺面,就是其中之一。到合肥,我上了中正中学,这是蒋介石的一个亲戚出资兴办的一所私立中学,规模不大,来头不小。我已读了三年初一,这次当然上了初二。也许是不再听大鼓书的缘故吧,我总算迷途知返,开始认真读书,1947年初中毕业并顺利地考上了南京的名校之一——金陵大学附中高中。在金中读了三年,成绩一直不错。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语文老师宋家祺先生很赏识我的作文,曾在课堂上朗读过其中一篇的几个片段,给我很大的鼓舞,使我终身难忘。二是毕业时我以前三名的成绩获得保送金大化学系的资格。但我当时志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自动放弃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说起北大,大约是1948年初,有一天我路过中央大学附近的成贤街,看到路边的一张海报:北大校长胡适博士正在这里讲《水经注》。我对胡适很崇拜,当即溜进去听了一个多小时。胡适那天究竟讲了什么,我已毫无印象,只记得他说自己是“过河卒子”。

1950年8月,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此与历史学结缘,学历史,教历史,忽忽五十余年,未越“门墙”一步。

可惜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回首自省,深感愧对师友!

我入学不到半年,因咳嗽不止,查出患有肺结核,而且是浸润型,需要隔离疗养。我入学时体检没有发现这个病,显然是新近感染的。原来,当时北大西斋“肺健会”里有几位老病号是历史系高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是桥牌迷,听说系里刚来一位新生桥牌打得好,便拉我入伙。我受到学长们的赏识,当然高兴,玩得很卖力,有时甚至达到通宵达旦的程度,不料几个月下来,就成了“肺健会”里的新兵。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十分焦急,促我回家养病。我征得系里的同意,决定休学半年,回合肥老家养病。

1951年,病灶硬结,我得以复学重读一年级。这时,赶上院系调整,北大与清华、燕京合并,历史系由沙滩红楼迁到环境优美的未名湖畔。合并后,学习纪律虽然比老北大严一些,但学习苏联老大哥,课程设置相当呆板单调。历史系除必修的政治课和外语课外,基本上是两门通史,而且重在课堂讲授。虽然名师云集,却无人开设有关史学基本功方面的选修课。记得邓广铭先生曾强调“目录、地理、年代和职官”等方面知识的重要性,称之为进入史学之门的“四把钥匙”,但立即遭到批驳。理由是我们有马列主义这把“金钥匙”,还要那些雕虫小技干什么?以致我在北大历史系八年,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系统地受过目录学、史料学方面的训练。近读章诒和女士《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说是提到北大历史系时翦伯赞竟气不打一处来,连说几个“糟”字。翦老当年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历史系究竟糟在哪里,糟到什么程度,他没有细说。我们当学生的当然不知其详。但我这个学习成绩不算差的学生,没有受到什么系统的历史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是不争的事实。

1955年毕业，留校当助教。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但尚未正式宣布，学校临时接到上级通知，根据中德文化交流协定，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维尔纳·洛赫教授被派到中国来教书，他本人要求到北大历史系教德国史。于是，系里决定让我和另一位留校毕业生当他的研究生，攻读德国史。我们这一届研究生有点与众不同，名称是副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毕业后就是副博士。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很诱人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对我的学业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在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很重视英文，因而我的英文程度是不错的。到北大后选修第二外国语——俄文，根本没学过德文。当了德国史研究生，学德文成了头等大事，差不多两年时间，我把全副精力都用于学德文。由于自己的努力，加上哲学系熊伟教授的悉心指导，我不仅可以看一般的德文书，而且翻译了几篇德文学术论文，其中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库琴斯基的《论工业革命问题》长文和政府总理乌布利希的一篇政论文，先后在1957年的《史学译丛》上发表过。熊伟教授是德国二十世纪初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入门弟子，来头不小，当时大概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居然屈尊来给我们这两位“副博士”研究生当口语翻译。他当时已年近六十，身体也不大好，但工作认真，态度谦和，对我们这两个“小朋友”更是爱护有加，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

说到学德文，有一个小插曲：一天，我在去中关村的路上碰到邵循正教授，邵先生的元史专家，精通多种外语，学生们都非常尊敬他。当时，他走过来笑问：“杜经国，听说你德文学得不错。”我忙说：“不行，不行。”他问：“能说吗？”我说：“能说几句，

很勉强。”他再问：“能写吗？”我又说：“不行，不行。”只见他把脸一沉，说：“不能写，那算什么学得好！”说完掉头而去，我立在路边，十分尴尬。

关于邵先生，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老人家烟瘾不小，在课堂上不到一小时也得抽得两三支烟。由于他上课总是弯着腰面对讲台，一般不看学生，讲课声音比较小，我总是争取坐在第一排。有一天，他讲课过程中手老是摸口袋，讲课也有点心不在焉。我当时也抽烟，知道他老人家烟瘾来了，于是乘他转身写板书，悄悄地把一包“大前门”和一盒火柴放到讲台上。他见到大前门，二话不说，点一支很愉快地就抽起来。有趣的是，下课时，他拿起烟和火柴就走了，全然不知道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1957年春，德语虽然学得不怎么样，但总算可以借助字典看书并且该准备写毕业论文了。专家建议把学习重点放在德国农民战争史方面，以便作中德两国农民战争的比较研究。我觉得很好。不料形势比人强，1957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整风反右的波涛席卷全国，北大首当其冲。此后一年多时间我在大风大浪中翻滚。究竟怎么过来的已经记不清，反正没有去学什么德国史。1958年12月由于有右派言论，学校人事部门以支援大西北的名义，提前半年把我分配到青海省教育厅，在教材编审室编乡土教材，大约一年左右，青海师院历史系因缺少教师，把我调去教世界近现代史。我在师院差不多两年，1961年，高教部通知全国高校历史系要开一门新课——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而且列在教学计划头条。兰州大学历史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朋友推荐我这个学过德国史的可以胜任，恰好时任兰大校长江隆基当年在北大任副校长，主持反右工作时曾对我

网开一面,把我列为可划可不划之列。他对我有一定印象,同意调入。就这样,我于1962年初到兰大历史系任教,教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毛主席论历史科学和中国近代史。这几门课对我来说都是新课,为了不负重托,62年到64年两年中我编了三本讲义,得到学生的好评。可惜,好景不长,64年社教运动,我下乡搞“四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这个“漏网大右派”当然在劫难逃,直到十年后复课闹革命才又重新走上讲堂。两年后,恢复职称评定,我被评为讲师。在此之前,我虽已在高校教了二十年书,却没有正式职称,也没有正式工资级别,而是按1955年入学时“副博士”研究生助学金的标准,每月领取57.5元。就是说,1955年到1978年,我当了23年的“副博士研究生”!

1978年,我当了讲师,这一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我开始写一些自己认为值得一写的文章。此前十多年,我虽然在课堂谈一些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时甚至是高谈阔论,但基本是采取孔老夫子的办法:述而不作。文章都是1979年以后才发表的。其中第一篇就是《洪秀全向西方国家找真理说质疑》,上海《学术月刊》发表时改为《洪秀全向西方国家寻找的是什么?》我对洪秀全这个人印象很坏,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好话。这篇文章在上海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上曾引起一定的争论。但不久后就为上海《学术月刊》采用了。十年后我来汕头工作,才知道当时《学术月刊》的主编是王亚夫,而且是汕头人。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试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篇文章获得了不少师友的好评,在他们的鼓舞下,我用了几年时间,写成了《左宗棠与新疆》一书。

这本书获得了中国史学会颁发的最高奖。

我从1962年开始讲授史学理论课,断断续续十几年,编写了几套讲稿和讲义,大约是1985年,国家教委王方宪同志根据《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教材编选计划》,约我主持编写一本《历史学概论》。我感到很荣幸,找到北大历史系老同学庞卓恒、陈高华两位教授,请求支持,承他们盛情允诺,在两年左右完成编写任务,出版后获得好评,多次再版。

本集最后部分的“潮学散论”,是我87年来汕大任教后所写的几篇短文。1986年,国家教委根据小平同志指示,从内地高校抽调一批教师到汕头大学任教,我于87年来到汕头,有幸与汕头结缘,深为这里丰富而又独特的人文风习所吸引。出于史学工作者的职业本能和兴趣,我在历史系鼓吹潮汕历史文化很值得认真研究,于是,1989年,我和几位老师在董事长吴南生同志的鼓舞和支持下成立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并着手做了一些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接着又与市里一批热心文化事业的老同志合作,在潮学泰斗饶宗颐先生的关怀支持下,由刘峰同志领导,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潮汕文库》丛书和期刊《潮学研究》,我担任《潮汕文库》主编和《潮学研究》副主编,做了一些联络工作,争取学者们写稿。我自己基本上没有写什么东西,这主要是我对潮汕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太少,越是接触多了,越感到自己的肤浅,不敢班门弄斧。

杜经国 2004年10月于汕头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编 近代史新论

洪秀全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说质疑	3
试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	12
左宗棠与新疆	22
刘锦棠	180
封建官僚的自救药方——洋务运动	186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刍议	195
洋务运动与封建主义	201

第二编 史学理论

史学方法论七讲	213
第一讲 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213
第二讲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229

第三讲	历史发展的前进性与迂回曲折	246
第四讲	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269
第五讲	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283
第六讲	农民起义与封建治世	298
第七讲	几组史学概念的探讨	311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332
第一讲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335
第二讲	如何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365
第三讲	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	403

第三编 潮学散论

有关潮汕文化的两个问题	417
潮州学建设刍议	430
阳明心学在潮州	438
由翁万达晚年遭遇所想到的	441
《潮学研究》发刊词	451
《饶宗颐先生学术年历简编》序	454
校后记	457

第一编

近代史新论

洪秀全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说质疑

内容提要

1.西方的真理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就是寻找建设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思想武器,使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

2.洪秀全找来的是西方的独一真神——上帝。他虽按农民革命的需要,把这个霸气十足的“独一真神”改造为革命的“皇上帝”,不管洪秀全的“皇上帝”如何革命,它仍然是一个穿着中国龙袍的神物,是农民群众皇权主义的升华,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毫不相干。

3.农民群众向往的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不是资本主义。洪秀全作为千百万贫苦农民的代表,根本不可能产生向西方国家寻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愿望。

4.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同向西方学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5.洪秀全的平等思想同资产阶级的现代平等观念,具有不同的阶

级内容。

6.对洪秀全接受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事,应作全面考察,不能作为他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依据。

7.洪秀全是农民革命的领袖,他不是也不可能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

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我们一直把洪秀全说成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看来,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里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的意见,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具体含意。我们理解,所谓西方的真理,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就是寻找建设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思想武器,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一定时期的历史真理,在同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虽曾显示过巨大的威力,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它已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当时,在西方的各种社会学说中(这里不谈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并且,把自然科学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够确切),真正反映客观历史真理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来的革命实践也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具有真理的价值。然而,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能一蹴而就。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先进人士当时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即使知道,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他